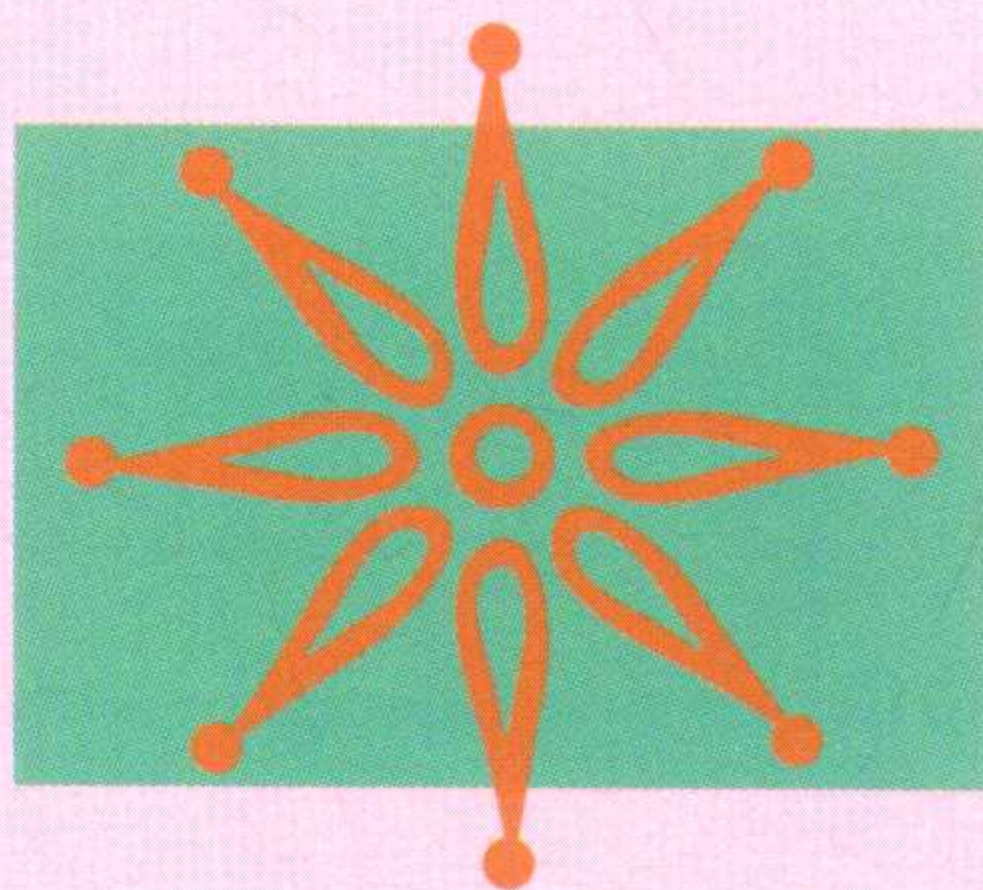


De Liberatorum Educatione



童幼教育今注

〔意〕高一志 著 〔法〕梅謙立 編注 譚杰 校勘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本書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晚明傳教士高一志‘義禮西學’系列
譯著整理與研究”(17CZJ012)階段性成果

童幼教育今注

〔意〕高一志 著

〔法〕梅謙立 編注

譚 杰 校勘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童幼教育今注 / (意) 高一志著; (法) 梅謙立編注;
譚杰校勘. —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7

ISBN 978-7-100-14676-0

I. ①童… II. ①高… ②梅… ③譚… III. ①耶穌會
—宗教教育—兒童教育—教育思想—研究—中國②《童幼
教育》—注釋 IV. ①B976.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7) 第157179號

權利保留，侵權必究。

童幼教育今注

(意) 高一志 著

(法) 梅謙立 編注

譚 杰 校勘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三河市尚藝印裝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4676-0

2017年12月第1版

開本 880×1230 1/32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張 8 5/8

定價: 46.00 元

目 錄

第一章 晚明耶穌會士高一志生平 / 1

- 一、高一志在義大利 / 1
- 二、高一志在南京 / 5
- 三、高一志在澳門 / 28
- 四、高一志在山西絳州 / 30
- 五、鞠躬盡瘁、長眠絳州 / 42

第二章 高一志教育思想的背景 / 46

- 一、耶穌會教育傳統 / 46
- 二、高一志在義大利接受教育 / 52
- 三、高一志在中國的學業與學術 / 67
- 四、高一志在山西絳州的學術活動 / 77

第三章 对《童幼教育》來源文獻及其結構的考證 / 85

- 一、玻尼法爵《基督教育》在澳門的重版 / 86
- 二、伊拉斯謨的《兒童禮儀》 / 90
- 三、維基歐的《教育六卷》 / 92
- 四、托雷斯的《王子倫理哲學》 / 95

第四章 《童幼教育》與文藝復興教育 / 99

- 一、教育的自然基礎，即父母遺傳 / 100
- 二、以正式教育補充自然 / 107

三、宗教與教育 / 113

四、耶穌會的教育制度 / 117

第五章 《童幼教育》與朱熹《小學》/ 120

一、中西教育內容介紹 / 121

二、中西教育的相同 / 125

三、中西教育的不同 / 130

第六章 關於《童幼教育》不同版本的考證及 《童幼教育今注》的說明 / 138

一、《童幼教育》的四個版本 / 138

二、關於本書校勘工作的說明 / 141

童幼教育 / 147

童幼教育序 / 149

童幼教育卷之上 目錄 / 152

童幼教育卷之下 目錄 / 152

童幼教育卷之上 / 154

教育之原第一 / 154

育之功第二 / 159

教之主第三 / 162

教之助第四 / 165

教之法第五 / 170

教之翼第六 / 174

學之始第七 / 179

學之次第八 / 183

潔身第九 / 188

知耻第十 / 192

童幼教育卷之下 / 198

緘默第一 / 198

言信第二 / 201

文學第三 / 206

正書第四 / 211

西學第五 / 216

飲食第六 / 221

衣裳第七 / 225

寢寐第八 / 228

交友第九 / 231

閑戲第十 / 235

附 錄 / 239

(一) 高一志生平年表 / 239

(二) 民國年間《童幼教育》跋 / 241

(三) 崇禎八年絳州知州雷翀告示 / 242

(四) 平陽府疆域圖 / 244

(五) 絳州州屬五縣圖 / 245

(六) 東雍書院圖 / 246

索 引 / 247

參考文獻 / 255

第一章 晚明耶穌會士高一志生平

段春生（香港神修院神哲學院教授）

隨着西學東漸研究的逐步深入和細緻化，學術界對高一志（或王豐肅，Alfonso Vagnone）的關注不斷增多與深入。關於高一志生平的研究，最早是1647年（清順治四年）韓霖和段袞在《辯教論》和《聖教信證》中的記述。這以後的1868至1875年間，法國耶穌會士費賴之編撰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以及之後榮振華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鄧恩的《巨人的一代》，這些關於高一志的著作對其生平都有簡單的回顧與介紹。本文再一次介紹高一志的生平，其優勢在於使用的是在義大利發現的第一手資料，尤其是保存在羅馬耶穌會歷史檔案館的高一志年信，以及其他耶穌會士在年信中關於高一志生平事蹟的記述，以此本文得以盡量豐富其生平事蹟。

一、高一志在義大利

1566年1月，高一志出生于義大利都靈郊區的特洛伐雷洛區的一個顯赫且具有濃厚信仰氛圍的貴族家庭，其家庭背景對高一

志早年的成長以及教育有重要的影響。^[1]

17 世紀中叶，耶穌會士在義大利北部倫巴第（Lombardi）、皮埃蒙特（Piemonte）創辦了許多學校。當時耶穌會總會長是方濟各·博爾吉亞（Francesco Borgia, 1565—1572），他修訂了耶穌會的“教育計劃”（*Ratio Studiorum*）。^[2]後來，由於公爵的經費匱乏，以至於擱置了新建耶穌會學校的計畫，不久，蒙道維的學校也被迫停辦。皮埃蒙特首府都靈（Torino）的耶穌會學院雖然負債累累，但還是成為大學新的地點和傳教最佳的前沿陣地。^[3]而高一志就是在都靈耶穌會學校完成了良好的人文學培育。^[4]

[1] 關於高一志出生的時間，史料中記載兩個版本，費賴之、巴托利、方豪等均認為高一志出生於 1566 年，於 1640 年去世，享年七十四歲。他們可能是根據高一志在 1616 年在《南宮署牘》中自述“年五十歲”所推測。但法國耶穌會士榮振華則“認為高一志生於 1568 年左右”，根據是“因為 1599 年的人名冊認為他在 1597 年已 29 歲，而 1600 年的人名冊又在 1599 年 1 月間把他記載為 31 歲”。參見〔法〕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中華書局 1995 年版，第 690—691 頁。榮振華著作的根據是保存在羅馬耶穌會歷史檔案館的關於高一志的人名冊記錄。幾年前，筆者查閱核對了榮振華所考證的資料，並曾兩次去拜訪高一志的家族後代，參訪了高一志出生時就有的教堂，希望在該教堂的檔案館能找到有關高一志出生及受洗的時間，但保存的資料僅可以追溯至 1700 年。筆者根據高一志家譜中的記載，確定高一志生於 1566 年。

[2] 參見 M. Casassa, S. J., “La Compagnia di Gesù nelle Province di Torino e Aosta”, in *La Compagnia Gesù nella Provincia di Torino dagli anni di Emanuele Filiberto a quelli di Carlo Alberto*, Torino: Società Piemontese di Archeologia e Belle Arti, 1998, pp. 13-24.

[3] 參見 W. E. Crivellin, “La ricostruzione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a Torino (1870-1916): un primo bilancio”, in *I Santi Martiri: una chiesa nella storia di Torino*, B. Signorelli ed., Torino: Compagnia di San Paolo, 2000, pp. 157-182.

[4] J.W. O’Malley, *The First Jesui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8; 亦參見 B. Signorelli, “L’ultima collaborazione fra lo Stato Sabauda e la Compagnia di Gesù in epoca di antico regime: la creazione degli ospizi e delle congregazioni di carità”, in *La Compagnia di Gesù nella Provincia di Torino dagli anni di Emanuele Filiberto a quelli di Carlo Alberto*, Torino: Società Piemontese di Archeologia e Belle Arti, 1998, pp. 221-246.

1584年10月24日，十八歲的高一志正式進入了耶穌會。^[1]他先做了兩年的靈修工夫（稱為“初學”），然後從1586至1589年，學習三年哲學。根據耶穌會的慣例，他需在1589至1592年參加教學實習，在同一個學校教授三年的人文學。最後，1592至1597年完成長達五年的神學學習。^[2]

高一志從1584年10月24日進入耶穌會直到1597年1月結束學習，期間經過了十二年時間。這個培育過程反映出耶穌會“教育計劃”逐步臻於完善的過程。^[3]結束學業後，高一志經過考核，至少於該年底領受了司鐸聖職。^[4]由於高一志成績優秀，故被任命為該學院教授，從1597年至1603年，出發去中國之前，他一直在米蘭教授一些人文學、哲學和神學的課程。^[5]

那時利瑪竇在中國傳教的事蹟不斷傳到歐洲，激起了許多青年耶穌會士奔赴遠東傳教的高度熱情。身在米蘭的高一志也不例外，他曾兩次向總會長阿奎維瓦（Claudio Acquaviva, 1543—1615）申請去國外傳教。^[6]第一次是1602年7月9日，他在米蘭

[1] ARSI, Jap. Sin., Catalogo 1592, p.24;〔法〕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690—691頁。

[2] ARSI, Mediol. 47, f. 24v, f. 58r, f. 108v-109r; 也參見 D'Elia, *Fonti Ricciane* II, Roma: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9, pp.277-278。

[3] 耶穌會“教育計劃”，直至1599年已完成定稿。

[4] 查閱關於高一志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的所有資料時，筆者沒有發現他晉升神父的日期，但通過其他相關資料至少可以證明在該年底他已經領受了神職。

[5] 布雷拉公學院於1621年與1624年的記載披露了高一志的信息：“in Societate studuit rethoricae annis 2, philosophiae annis 3, theologiae 4, docuit litteras humaniores annis 3, rethoricam 2, philosophiam 3, theologiam 2。” ARSI, Jap. Sin., 134, f. 302[...]; 參見 D'Elia, *Fonti Ricciane* II, p. 278。

[6] 〔意〕汾屠利（P. T. Venturi），在《利瑪竇歷史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 I.*），第451頁，談到了高一志於1592年曾致信給總會長阿奎維瓦，申請去中國傳教，但筆者在找到了這封信（寫於1592年3月30日）後，發現其內容是高一志寫的關於當時在阿羅納（Arona）的耶穌會院院長梅拉諾（Mellano）及當時在米蘭布雷拉公學院的著名神學家及哲學家的生活片段的介紹。

致信給阿奎維瓦，提到了自己在一個港口休假，在那裏他萌生了渴望到國外，特別是去中國傳教的願望，“因着我們的會祖依納爵之名，及我們的主天主對我們的愛，特別是爲中國那些可憐的尚不認識天主的人的靈魂，我誠懇請求您在下一次能派遣我去中國傳教。爲了實現這一個願望，我從初學時就很渴望前往中國傳教，即便您自己認爲去日本更好”。爲了表明自己有能力勝任赴遠東傳教的任務，他說“我剛結束了學習，且精力充沛……有信心也有能力繼續學習”。他自信有學習外語的能力，“我認爲不會感到非常困難……就如在過去幾年已經學習和掌握了希臘語和希伯來語一樣”^[1]。同一年的8月20日，他於米蘭致信給總會長表達了他的感恩之情，“我非常喜悅地收到了您讓我們前往中國和日本的充滿希望的信”^[2]。在這封信中，高一志已經確切得到了總會長的答复，也知道他將與其他會士一同奔赴遠東去傳教。

1603年4月9日，三十七歲的高一志如願以嘗前往中國。^[3]他先從米蘭出發到了當時的威尼斯，然後從那裏出發去了里斯本，再從里斯本乘“聖若望號”船出發去印度。^[4]與他同行的有日後在日本殉道的聖人科斯坦佐（Camillo Costanzo, 1571—1622）、在錫蘭殉道的聖人邁特拉（João Metella）以及在中國傳教的林斐理

[1] ARSI, FG 734, fol. 383; 參見 Camilla Russell, “Vocation to the East: Italian Candidates for the Jesuit China Mission at the Tur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Renaissance Studies in Honor of Joseph Connors II*, edited by Machtelt Israë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321。

[2] ARSI, FG 734, fol. 383; 參見 Russell, p. 322。

[3] 參見 Venturi,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 I.*, p. 51; 也參見 D’Elia, *Fonti Ricciane*, p. 277。

[4] ARSI, *Jap. Sin.*, p. 342, 499; 參見〔法〕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690—691頁。

(Feliciano da Silva, 1578—1614) 和陽瑪諾 (Manuel Dias Júnior, 1574—1659)。高一志被任命擔任此次旅行耶穌會士的負責人。^[1]

高一志一行歷經乏味、惡劣的海上長途旅行後，終於在 1604 年 7 月抵達澳門。^[2] 陽瑪諾由於患病留在澳門聖保祿會院，而“王豐肅與林斐理前至韶州住了幾日，又到江西南昌府住了四個月”^[3]。該年 12 月份又重新出發，於 1605 年 2 月底，終於抵達目的地——南京。^[4]

二、高一志在南京

被任命為南京會院負責人

葡萄牙耶穌會士羅如望 (João da Rocha, 1565—1623) 是南

[1] 參見 Bartoli, IV, p.27; 也參見 D'Elia, *Fonti Ricciane* II, pp.277-278。

[2] 參見〔法〕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 691 頁。

[3] 參考周駢方編校：《聖朝破邪集》，《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獻叢編》第二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5 頁。參見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香港公教真理協會 1967 年版，第 150 頁。

[4] 〔法〕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 691 頁。在《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册，第 159 頁，方豪記載高一志一行在海上旅行了“兩年零四個月，於萬曆二十七年七月達到廣東廣州府香山奧中”。經過考證，發現方豪記載的關於高一志到澳門的時間是根據徐昌治編訂《破邪集》所定，他並沒有對此作進一步的考證。《破邪集》所記是徐昌治根據高一志的口述而成，按理應該是正確的，但是通過其他資料的考證發現，《破邪集》此處記載高一志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到了澳門，這一時間有誤。由此判斷，方豪引用的高一志到澳門的時間有誤，極有可能是記錄員在記錄時文筆有誤所致（《破邪集》於萬曆四十五年八月南京督查院同知林有梁回諮）。參見周駢方編校：《聖朝破邪集》，第 125 頁。

京會院的負責人，同時也負責教授高一志、林斐理等新來會士學習中文。^[1]1605年3月16日，高一志曾致信羅馬耶穌總會長阿奎維瓦，詳細匯報了從里斯本到南京的過程，以及他們到達後開始學習中文一事，“我們跟羅若望神父學習中文和文學”，為的是“早日在這個幅員遼闊的帝國開始傳播福音”。^[2]同時，高一志也開始學習中國經典。^[3]

1604年至1609年期間，在利瑪竇領導下的中國耶穌會傳教團風平浪靜，一切依常規而行。據《破邪集》記載，“豐肅數年以前，深居，簡出入，寡交遊，未足啓人之疑，民與之相忘，即士大夫亦與之相忘”^[4]。這段時間，高一志深居簡出，努力學習中國語言和儒家典籍。如前文所言，早在米蘭學習神學和哲學之時，高一志即被利瑪竇在中國的傳教事蹟所振奮和鼓舞，渴望早日去中國傳教，而今如願以償，因而他加倍努力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學。高一志學習語言的天賦，在米蘭布雷拉公學院學習希臘語和希伯來等語言時，就已脫穎而出。1606年2月15日，在致總會長阿奎維瓦的信中，利瑪竇特別談到“王豐肅神父在南京已兩年了，努力學習中文與文學，很有成績，做事睿智有德，那裏的長上對他非常滿意。他入會已多年，學業與受試皆表現良好，相信他可以矢發本會四大聖願。”^[5]六個月後，即該年的8月13日，高一志在南京宣

[1] 參見 Venturi, 第 451 頁; D'Elia, *Fonti Ricciane* II, pp.277-278。

[2] ARSI, *Jap. Sin.*, 第 207 頁; 也參見費賴之, 第 88 頁。

[3] 參見 ARSI, *Lus.*, 3, 第 149 頁。

[4] 周駉方編校:《聖朝破邪集》, 第 121 頁。

[5] (意)利瑪竇著, 文錚譯, 梅歐金(Eugenio Menegon)校:《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 商務印書館 2014 年版, 第 461 頁; (法)費賴之著, 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一冊, 中華書局 1995 年版, 第 88 頁。

發了耶穌會第四聖願。^[1]

1609 年，鑒於當時傳教形勢的需要，利瑪竇安排陽瑪諾去了澳門，羅如望被派往南昌，高一志因成績與能力突出，則被任命為南京會院的負責人。^[2] 此時高一志來南京已有四年的時間，而南京會院的重要性僅次於北京會院。

學術傳教

1610 年左右，高一志為官員許樂善（1548—1627）作《性靈說》。同一時期，在徐光啓（1562—1633）協助下完成了《推演正道論》及《諮周偶編》。這兩部小書可以看作是遵循利瑪竇傳教策略的典範之作。後高一志又通過學習儒家經典，於 1615 年著《教要解略》，並以四篇神學論文對利瑪竇的《天主實義》做了註釋。同一年，又著《西學》一文，後收錄在 1632 年在絳州出版的《童幼教育》一書中。^[3] 耶穌會史學家巴托利（Bartoli）記載：“初入中國之四年，一志精研中國語言文字，歐羅之人鮮有能及之者。

[1] 參見 ARSI, Lus.3, p.149; 也參見 D'Elia, *Fonti Ricciane* II, p. 278。耶穌會發第四聖願是耶穌會建會之初，依納爵特別向教宗做的承諾，要絕對服從教宗安排，到世界各地去傳教。

[2] 參見 Ricci, *Lettera Annuale del 15 agosto 1606*, ASIA, Jap. Sin.; 參見 D'Elia, *Fonti Ricciane* II, pp.277-278; 也參見 Venturi, *Opere storiche*, p.302。

[3] 這四篇論文：“第一篇是關於天主，第二篇是關於靈魂，第三篇是有關於原罪，第四篇是講述救主耶穌生平。”至於這四篇論文的内容，尚未看到。高一志於 1615 年著的《教要解略》是對天主教“天主經”、“信經”等各種經文的詮釋。參見（意）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第 461 頁。

因是撰作甚多，頗為中國文士所嘆賞。”^[1]巴托利認為，“南京的基督徒比以往增加了一倍多，他們所表現的虔誠和熱心堪與北京的基督徒相媲美。如同龍華民神父（Nicolò Longobardo, 1559—1654）所說的，南京官員們也很欣賞我們天主教的信仰與耶穌會神父們”^[2]。

法國耶穌會士高龍輦（Auguste Colombel, 1833—1905）在《江南傳教史》中認為高一志在南京時“是南京教務的全盛時期”。^[3]因為“經常造訪南京的徐光啓和李之藻（1571—1630）在激勵天主教團體的熱誠上，曾給了高一志無可估量的幫助。”^[4]在中國傳教區，“由高一志負責的南京傳教點工作似乎是最興旺的，皈依天主教的人數也是最多的。南京的工作受到了神父們的讚賞，天主教的信仰也得到了極高的評價”^[5]。高一志後來在寫給耶穌總會長阿奎維瓦的年信中，自述當時教會迅速發展的原因：“一是教友們熱心參加聖母會；再者，是由於徐光啓與李之藻基督徒生活的榜樣。”因為“光啓在三年守制期間，屢至南京，以住院為下榻之處，使神父們取得官員保護。”^[6]徐光啓對教會的大力支持，為高一志在南京的傳教活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耶穌會的傳教策略是自上而下地向社會各階層進行傳教，認為要想讓一個國家皈依基督宗教，首先要歸化那些在社會上有權

[1] Bartoli, *Opere* XVIII, p. 1144; 也參見 D'Elia, *Fonti Ricciane* II, pp. 277-278.

[2] Bartoli, *Opere* IV, p. 25.

[3] 〔法〕高龍輦（Aug. M. Colombel）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一冊，臺灣輔仁大學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8 頁。

[4] 〔美〕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第 106 頁；也參見張凱：《龐迪我與中國》，大象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30 頁。

[5] 張凱：《龐迪我與中國》，大象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30 頁。

[6] 〔法〕高龍輦：《江南傳教史》第一冊，第 148—149 頁。

力和有影響的人物，使他們對下層社會的皈依發揮大的影響力。^[1]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激勵下，高一志努力實踐利瑪竇的文化適應與學術傳教的策略。至萬曆三十八年（1610），在南京“為數眾多皈依者中，有三位是官員”，其中一位是姓許的“相當重要的官員”^[2]，另一位“是張多默，二人都是進士出身，西史稱之為博士”^[3]。黃一農認為第一位姓許的官員乃許樂善，“字修之，號惺初，江蘇華亭人，隆慶五年進士，後升至南京通政使”^[4]。他是當時奉教官員中除徐光啓之外職位最高的一位。在徐光啓的介紹下，許氏與高一志過從甚密，並由高氏接受了洗禮，聖名若望。^[5]徐光啓在這位未來成為自己兒女親家的許樂善的皈依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當許樂善“第一次讀利瑪竇神父的《天主實義》時，感覺味如嚼蠟，這大概是因為書中蘊藏的真理與他所持的觀點不大一

[1] 〔美〕孟德衛（David E. Mungello）：《1500—1800 中西方的偉大相遇》（*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新星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4 頁。

[2] 〔美〕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第 106 頁。

[3] 〔法〕高龍鞏：《江南傳教史》第一冊，第 149 頁。

[4] 黃一農認為這個許姓官員，並非如德理賢（Pasquale M. D'Elia, 1890—1963）和裴化行（Henri Bernard, 1889—1975）所考證的“許胥臣”，因為許胥臣為浙江錢塘江人，曾經為艾儒略的《西學凡》和《職方外紀》作序。“他並未中舉也不曾出仕，故不可能擔任專司納言的正三品通政使一職。”參見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台灣“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4—85 頁。

[5] 鄧恩認為許姓官員（樂善）受洗在 1612 年（《從利瑪竇到湯若望》，第 106 頁），應為有誤。根據高龍鞏考證，1611 年 5 月 3 日，高一志在南京奉獻聖堂典禮時，許樂善還曾贈送一幅對聯，懸掛在祭台兩側，在建教堂前許樂善亦曾捐款。由是可以斷定，許樂善受洗當在 1611 年之前。參見〔法〕高龍鞏：《江南傳教史》第一冊，第 148 頁。黃一農認為許樂善受洗確切時間應當在萬曆三十八年（1610），此說當為可信。參見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第 84 頁。

致”^[1]。當高一志發現他對宗教沒有興趣，就不和他談論宗教，而是給他做了一個地球儀，並在上面加上了適當的注釋。當許樂善嘖嘖稱讚科學的高超和奇妙時，高一志趁機對他說：“與我們的聖教相比，數學簡直不值一提，聖教的理論比數學更為高深，更為必要。”^[2]這些話在他心裏產生了強烈的震撼，促使他“仔細閱讀基督教的戒律……認真地、以新的思想和態度來重新閱讀利瑪竇神父的教義問答……高一志神父送他基督像，他穿上全副官服來接受它”^[3]。此處的“教義問答”可能指利瑪竇的《天主實義》。從這位許姓官員受洗的過程不難看出，正是由於徐光啓的熱情推薦與高一志的循循善誘，使得許氏最終皈依了天主教。高一志先以科學吸引，再以教理歸化的傳教方法，在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堪稱為典型。

而後來南京禮部侍郎沈淮在 1616 年給萬曆皇上的第一道奏疏中，表明了高一志對於上流社會文人學士的影響，“臣初至南京，聞其聚有徒衆，營有寶廬，即欲修明本部職掌，擒治驅逐。而說者或謂其類實繁、其說浸淫人心，即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4]。一向關注從外教典籍中尋找研究天主教史料的著名史學家陳垣（1880—1971）在引證明末高僧祿宏（1535—1615）的撰《天說》時說：“現前信奉士友皆正人君子，表表一時，衆所仰瞻以為向背者，予安得避逆耳之嫌，而不罄其忠告！”並說，“奉教者為賢士

[1]（意）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第 461 頁；也參見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第 84 頁。

[2]（意）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第 461 頁。

[3] 同上書，第 595—596 頁。

[4] 周駢方編校：《聖朝破邪集·南宮署牘》，第 115 頁。

良友，正人君子，此反對者之言也”^[1]。方豪精闢地分析了沈淮對高一志的控告，並充分肯定高氏在南京的傳教成績：“一方面是‘其類實繁’，證其數字之多；一方面有‘士君子’‘信向’，更證信教者素質之高。”^[2]《明史·沈淮傳》將高一志作為與利瑪竇相同的人：“西洋人利瑪竇入貢，因居南京，與其徒王豐肅等倡天主教，士大夫多宗之。”^[3]從反教者的立場看反而更加證實了高一志在南京的傳教成績，凸顯出他在培育新教友時，堅持“質”與“量”並重，在士大夫文人心目中樹立了一個良好的形象。

興建教堂

由於南京的傳教工作很順利，高一志幾乎與中華耶穌會負責人龍華民持相同的觀點，他們認為當時的環境很安全，可以建立一座教堂，以吸引更多的人成為基督徒。^[4]在當時的南京要建教堂，首先需要得到政府官員審批，也需要估計本地宗教信仰對此的反應。巴托利對此談道：“在談南京基督徒信仰生活之前，我要先談一下他們建立的教堂，這不僅需要資金，而且還有一個事實，在中國首先需要得到政府官員許可，才可以在其他宗教廟宇或自十五世紀以來已經存在的家廟附近，建立一座為敬拜天主的教堂。”^[5]這一切的困難，在楊廷筠（1557—1627）和許樂善等奉教

[1] 陳垣：《從外教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民元以來天主教史論集》，臺灣輔仁大學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1 頁。

[2] 參見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第 148 頁。

[3] 同上。

[4] 〔美〕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第 95、97 頁。

[5] 參見 Bartoli, *Opere* XVII, pp.24-26。